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自律与他律

——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钱中文 刘方喜 吴子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生成系列



自律与他律

——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钱中文 刘方喜 吴子林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301-09779-4

I. 自… II. ①钱…②刘…③吴…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6693 号

书 名: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著作责任者:钱中文 刘方喜 吴子林 著

责任编辑:徐丹丽

标准书号:ISBN 7-301-09779-4/I·076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1 印张 333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编委会

顾问：启功

主编：童庆炳

委员：钱中文 王先霈 程正民 朱立元

童庆炳 郭英德 金元浦 罗 钢

周 宪 陶东风 黄卓越 王一川

李春青（常务） 周小仪 曹卫东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童庆炳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回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宪法性”口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化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人们已经对兴起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论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以隔绝的眼光关注文本自身,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会与现实,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的紧迫问题。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文本自足”的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

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的狂欢和“语言”的狂欢,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

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板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庸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主要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惟”这些东西为主臬,为上帝,为神明,那么物欲、金钱欲、情欲、交换欲等人的生物性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和文化语境,乃是根植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并非完全从外国搬过来的。

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目前

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过分政治化的话语,过分“社会学”化的话语,也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面临学科体系受到冲击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如果不一味滑向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不一味坚持其二元对立的僵硬的方法,那么由于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使文学理论原有格局发生变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过来,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不足取的。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如“文革”前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批评经验,在经历过“文革”的教训之后,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成果,还有其他一些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但要继承下来,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在审美、主体、语言和其他方面,仍然有发展的广阔的空间。

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怎么能把“诗意”“反”掉呢?我们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不值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我们不必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外国的文化研究与我们的文化研究究竟有什么异同?一般认为,国外的文化研究是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特色是一种政治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到了晚期,早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已经被文化的渗透所代替,是让人异化,舒舒服服地变成奴隶,成了奴隶还感觉不到。文化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它关键的词语是种族问题和东方主义、性别问题和女性主义、地域问题和社群主义、阶级问题和社会主义、古今问题和新历史主义等。其研究是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出发,而选取了这样一些话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批批的文艺学流派。我们的文化研究则要走自己的路,或者说要按照中国自身的文化实际来确定我们自身的文化诗学的思路。

我现在所想到的是,文化诗学研究就其基本原则说可以有五点:

第一是历史优先原则。文化语境的研究,不论我们是研究现代的文学问题还是古代的文学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放置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尽管绝对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往往难以追寻,但是无论如何难,我们还是要自觉地去。过去我们的研究也常这样做,但我们常常不够自觉。更多的时候,就理论问题谈理论问题,注意的是观点和形式逻辑,所以别的专业的人士常说我们搞理论的人所写的文章比较空。文化诗学应该自觉改变这种状况,使我们讨论的问题进入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所讨论问题的针对性自然会凸现出来,自然会摆脱那种脱离现实

的状况。

第二是对话原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还是研究前人的文学理论,都是对于作家、作品或原有理论家、理论作品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不是独语,而是一种对话。我一直主张古今要对话,古和今是两个主体,要进行对话,要把古代的东西激活,然后进行对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其次是中西的问题。与古今问题一样,哪些可以全球化,哪些不可以全球化。实际上这也是文化研究中很热的一个问题,这里面问题很多。我认为,中西问题是

一个对话和共享的问题。另外,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或理论家的一种对话。对话要真正的平等才能深入地展开。就像我们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一定要平等相待,充分地恳切和真诚,彼此才能敞开心扉,通过交谈,做到双方都受到教益。我们在对作家(作品)、理论家(理论著作)的研究中也应该是如此。把对象也当成一个值得尊崇的主体,想尽一切办法激活它,让它似乎也真的成为一个鲜活的主体,能够袒露自己的真意;而作为研究者也自然是一个主体,能以商榷的态度,而不是以强加于人的态度,与对象实现真实的对话。只有在这种对话中,研究才是比较客观的和可靠的,而不是主观的、随意的。

第三是自洽原则。文化诗学的研究,应该是圆融的,能够自圆其说的。例如其中的阐释、比较,不能自相矛盾或前后矛盾,应该在观点和方法上一以贯之,逻辑上能自洽而圆通。你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和新的比较,但必须合情合理。所有片面的论述,其中弱点之一,就是不能逻辑自洽。

第四是联系现实问题原则。学术研究完全可以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的独立性是应该受到尊重的。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初的杰出学者王国维就说得很清楚。但文化诗学的思路则如上面所述,应该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研究,提炼出某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来。这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正好是现实所缺失的东西,因此我们通过文化诗学所获得的成果可以弥补现实的不足,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馈。当然,我们的研究可能不是对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正面研究,不可能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研究那样正面解决社会问题。但从诗学的视野出发的研究,可以以间接方式回应社会,不也很好吗!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累积的问题很多。文化诗学应该有问题意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的文化研究应该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对诗意的追求。文化视角无论如何不要摒弃诗意视角。我们要文化,但也要诗意、语言等等。大可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是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

目 录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1)
----------------------	-----

第一章 自律与他律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前文学观念之争	(1)
第一节 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与文学观念的现代化需求	(3)
第二节 现代性与文学观念多元表述与论争	(6)
第三节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文学观念之激变， 自律与他律之争	(25)
第四节 文学观念的亢奋，向他律的倾斜与对他律的越界	(44)

第二章 断裂与赓续

——新诗现代化、民族化、形式化关系的历史重构	(67)
第一节 “意象化”、“戏剧化”与“声情化” 关系之阐释与重建	(67)
第二节 “格律化”与“自由化”关系之阐释与重建	(84)
第三节 “现代化”、“民族化”与“形式化”关系之争	(98)

第三章 分流与融合

——文学意识形态化、消费化、生产化关系的历史重构	(116)
第一节 “意识形态化”文学观的建构	(118)
第二节 “消费化”文学观的生成	(135)
第三节 中国文学现代化“生产化”向度的重构	(155)

第四章 先锋与回归

——现代派之争及其发展	(164)
第一节 现代化、现代派与伪现代	(164)
第二节 先锋小说、后现代主义与新历史小说	(179)

第三节 现代派之争的理论思考	(193)
第五章 语言与图像	
——图像艺术与语言艺术的前景	(206)
第一节 文学会“终结”吗?	(206)
第二节 “图像”替代“文字”?	(218)
第三节 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	(228)
第六章 民族与世界	
——文化“一体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问题	(238)
第一节 文化全球化、一体化之辩,现实性与不可能性	(240)
第二节 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辨析	(254)
第七章 文化与文论(一)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	(273)
第一节 文化研究应有的现代性诉求	(273)
第二节 文学理论不会被文化研究替代	(280)
第八章 文化与文论(二)	(292)
第一节 近期文学理论中的三次冲击与第三次冲击的成因	(292)
第二节 文艺学、文学概论与文学理论辨析	(301)
第三节 当今文学理论还是“前苏联体系”吗?	(304)
第四节 古代文论现代转化是对“前苏联体系”的 “眷恋”吗?	(313)
第五节 存在什么“后现代真经”吗?	(320)
后 记	(325)

第一章 自律与他律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前文学观念之争

我国的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起步比较晚。近一百多年,是我国文学理论走向现代化的时代,不断地加深认识、建设的时代,但作为学科的建设,却经历了十分曲折的道路。在这一曲折的过程中,有过自由探索文学观念的阶段,出现过多元的文学思想并存、争鸣的阶段,同时也有过力图一统文学观念的阶段,被政党、行政力量进行严格规定以致对持不同文学观念者进行大规模清剿的阶段,到当今复归于多元表述的阶段。

文学观念的不同探讨、表述、论争,从主导方面看,实际上是在现代历史精神的追求中进行的。近、现代历史追求的意向,就是一种反对封建等级、专制残暴、落后愚昧的现代意识精神,它通过对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理性、人道、法制、权利的普遍肯定,实施与完善,体现为一种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理性精神与启蒙精神,一种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一百多年来,文学观念的演变,正是在现代性的策动下进行的。现代性固然表现为一种普遍原则,但是在不同时代、国家其内涵不尽一致,同时在不同集团、不同个人那里,表现又各有差别,以致出现了多种文学观念。但是文学观念的主导旋律,则是启蒙与救亡。

百多年来文学观念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时期。

一、1840 年前后的萌发状态,文学观念开始脱离千年传统而表现了新的时代意向。但就其形式而论,文学理论仍是原有的传统诗论;诗论话语也是传统的话语。

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既出现了从传统诗论转向现代文论短暂的过渡期,又出现了文学观念现代化的首演。这种结合,在梁启超、王国维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梁、王二人,既是传统诗论的继承者,又是现代文论

的开创者。梁启超的文论,既有传统诗论,同时又发扬了传统中的政治教化精神,与引进过来的西方文学观念相结合,直接以启蒙与救亡为导向,显示了其强烈的现代性特征,于是过去诗论中那些经常使用的概念,现今被适应当代生活需求的文学观念所替代了。王国维也是如此,他既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中极为高妙的诗论,同时也引进了当时正在逐渐走向主导的西方文学观念,从而又从另一个方面,极大地改造了我国原有文学的观念。此外还出现了符合文学自身特征,但是由于与启蒙与救亡有一定距离,而后来常常受到主导文学观念挤兑与打击的现代性文学观念,不过一旦时过境迁,它们又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可以这样说,这时期的文学理论,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跃进,体现了文学理论现代性的重大转折。

在这过程中间,文学理论的话语急剧地现代化了,随着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于是旧有的诗论一改而为现代文论,随想、感悟式的文字,一变而为分析的、逻辑的论说性文字。原有的一套理论话语,一变而为现代文论话语,当然,实际上大部分是从西方引进的文学理论话语。

三、“五四”文学革命和文学转型时期,创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新文学,文学观念显示了现代性的突进。但是,新文学的突进运动,由于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激进情绪,而使得正在发展起来的文学理论现代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而 1930 年代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大辩论,使文学公开转向政治化,认为文学艺术本身就是政治的一定形式。

四、随后近四十多年间,文学观念现代性的激变与分化,出现了将外国的文学观与传统的政教精神合而为一的过程,并被一定时期的社会势力,将传统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发展到了极端,强加给了文学不堪忍受的生命之重,以致严重地脱离了它自身的轨道,阻碍了它自身的发展,显示了现代性的曲折轨迹,最后发展到了现代性的崩溃与反现代性。

五、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文学观念现代性的多元发展趋向,成了主导趋向。

文学观念现代性的发展,自然也应包括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的演变,这是文学观念现代性的应有之义。

本章主要讨论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前我国现代文学观念的演变。

第一节 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与 文学观念的现代化需求

文学观念的变革从来是先由内因造成的,虽然这动因有时十分隐蔽。

文学作为文学,是由文学作品的流传与接受而获得生命。唐宋以前的文学,包括那些伟大作家的作品,固然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千古绝唱。白居易的诗歌据说平民老妪都能背诵,佛教的宝卷的宣唱,产生了文学的新形式,赢得了低层广大的听众,但那些诗人们的诗作,主要还是在士大夫之间传播,文学的主流是朝廷、士大夫们专有的诗文,流传于民间的作品不算很多。到了宋代,词的兴盛向民间有所靠拢,勾栏瓦舍的演唱、娱乐,不管怎么说,使文学走向了市民与下层,接受面较为宽广。元、明、清时期的戏曲演出日益增多,改用白话写的小说得到长足的进步,使它们拥有众多的普通百姓与识文断字的市民。虽然诗文仍然被奉为文学的正宗,但它们同过去一样,只限于在宫廷、官僚、文人中间流行。随着城市的繁荣与变迁,小说、戏曲的数量日益增多,这些广为流行的文学样式,形成了足以与诗文相抗衡的真正的文学潮流而激动于民间。

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是互为依存的,它们都指向传统文化中的保守、落后的一面。现代性的文化反思与批判,引起了审美现代性的演变、新的审美话语的产生、文学文体的新生以及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

早在 1840 年以前,有识见的中国文人就已看到清王朝由盛世转向国运衰微和“衰世”的来临,他们怀着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奋力著述,痛陈社会弊端,要求改革政治。及至 1840 年之后,我国订下了不少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唤醒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自救图强的愿望,而把目光注向西方。人们介绍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声光、电化,重学、开办铁路、发展矿务实业等,同时也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外出文化考察与西方文化的输入,使得人们开始对世界整体局面有所了解和认识。各种社会势力的斗争与权力的争夺,发展到极其残酷的地步。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讲到:

“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渐拔;经

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帜,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①

这里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一批有所觉悟的士大夫阶层人物,见到外面世界的开化与进步后所持的清醒态度。开启民智、救亡图存那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我国近代这一阶段现代性的主要内涵。19世纪末的维新派的文学革新运动所导致的文学观念的更新,是由19世纪40年代前后诗文评的思想内在的变化所准备了,文学自身的发展,已积聚了变革的深刻的动因,同时由于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与碰撞,也就进一步促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文学观念和文学深刻的变化。

在杂文学的时代,我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往往是一身而兼任的。因此,他们的政治主张常常包含了他们的文学观念,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常常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因素。龚自珍倡导的“尊情”说,表达了对家国不振的忧患之情。魏源则提出文外无道、文外无治、文外无学、文外无教,强调的是文与诗的治国教化功能。相同的意思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也说过:“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②王韬广泛接触西学,改革之愿望自然强烈,在文学方面,他反对模仿前人,提倡“自抒胸臆”,要表述诗人面向残破家园的愤郁之情。他针对桐城派的诗文说:“余不能诗,而诗亦不尽与古合;正惟不与古合,而我之性情乃足以自见。”今之所谓诗人,“宗唐祧宋以为高,摹杜范韩以为能,而于己之性情无有也,是则虽多奚为?”^③严复接触的西学面甚广、甚深,热望科学、民主,用西学实用的目光,反对八股,痛陈弊端,批判过去的文化、政教典籍。1895年,他直接提出在此“救亡危急之秋”,就中

① 《梁启超文选》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246—247页。

② 黄遵宪:《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③ 王韬:《蘅花馆诗录自序》,《弢园文录》外编卷七,中华书局。见郭绍虞,罗根译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6页。

士学术的使用价值来说,“曰:无用”。在《诗庐说》中说:“诗者,两间至无用之物也。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以诗强,世之乱者不以诗治。”“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耶?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之失其真甚焉。”他对当时词章的评价,极为激烈,认为词章与经济殊科,词章不妨放达,故虽及蜃楼海市,恍惚迷离,但足可“移情遣意”,“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所以“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富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但一旦赋予其“事功”,则“淫遁波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而中土不幸,其学最尚词章”^①。其“用”与“不用”之说,是很有见地的。

就是过去被视为保守落后的、反对变革的一批人士,也感觉着世道之变,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中显示出变化来,如桐城派诸人。

同时文字语言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文学话语的更新,必然组成文学现代性体现的重要部分。黄遵宪作为维新改革派的人物,在倡导诗歌语言改革方面,十分着力。早在19世纪60年代末,就反对崇古因袭,提出了诗歌因时代而变的改革的主张:

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班。^②

他主张文字与语言的合一,以减少阅读的困难。从时代的变迁出发,他说:“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谈及语言与文字关系时,他说:“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然而离则如何?

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

^① 严复:《救亡决论》,《直报》(天津),1895年5月1—11日。《严复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57页。

^② 黄遵宪:《杂感》,《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5—16页。

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①

要求语言与文字合一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趋向口语。这样就出现了审美现代性与汉语现代性的交叉问题。

19世纪后半期,一面是西学东渐,一面是走出国门,这导致中西文化的相当广泛的交流与了解,包括对外国文学的认识。开始有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其中有通晓法文的陈季同,不仅将中国的一些剧作翻译出去,用法语写作介绍中国文化,同时对于外国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的了解也十分深入,并有独到的见解,提出中国文学要介绍出去,外国文学要翻译过来,形成一种当时闻所未闻的“世界的文学”观,我们在后面还将论及。

政治、文化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海禁的打开、外国文明的输入、自救图强的强烈愿望,引起了整个思想界的深刻反思、批判与更新的要求。到了19世纪末,终于形成了文学文体现代化的一次首演。首先是小说,然后是戏曲,再后是通俗文艺,成为文学中的主导走向,而把原来的传统诗文,排挤到了边缘,形成了其曲折的走向。

第二节 现代性与文学观念多元表述与论争

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纵论古今中外、历史演化,最后谈到“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他们认为小说对于西方和日本在开化发达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附印说部缘起,目的在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②。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梁启超主要寄希望于政治变革,为此积极奔走、呼号、上书清帝,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推行新政,明定国是,革旧维

^①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学》,《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7、118页。

^② 原载天津《国闻报》光绪23年(1897年)10月16日—11月18日。